

# 比较文明的“融新”:大熊猫的世界和谐之旅

方汉文<sup>1</sup>,方楠<sup>2</sup>

(1. 苏州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苏州, 215123; 2. 凯盈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昆山 215331)

**[摘要]** 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在文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达了文明融新与和谐发展的中国国家文明战略。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往中, 通过丝绸之路等交流通道, 具有象征性的动植物交流历来是促进友谊的重要手段。大熊猫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 熊猫交流成为不同文明间交往的纽带, 有利于中国复兴过程中的对外关系发展。

**[关键词]** 大熊猫; 国家文明战略; 文明融新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5)01-0110-04

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10 月 22 日为“汉代—中国汉代文物展”在法国开幕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中国人民在 2000 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的道理。中法分别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 两国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有助于夯实中法关系的民意基础, 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和法兰西文化交相辉映, 有利于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sup>①</sup>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 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特别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 大熊猫作为最具有中国文明象征意义代表, 旅程遍及各大洲, 成为中国新外交的明星。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受到中国与世界人民的珍爱。从 20 世纪中期中国政府将第一只大熊猫赠送给苏联开始, 到 2014 年 3 月中国大熊猫旅居比利时, 中国大熊猫的文化交往成为史无前例的外交、政治、科学经济文化的世界关注焦点。这种关注也必然形成了相关领域成为多种学科以生态文明为中心的研究领域。

半个多世纪里, 共有 45 只大熊猫远赴重洋, 旅居欧洲美洲亚洲的 12 个国家的 17 个动物园, 公开接受公众参观。<sup>②</sup> 使得中国大熊猫形象成为一种跨文明交往的独特造型。重要的是, 这种造型及其传

播已经成为一种跨越科学与人文的多学科研究对象。由此形成了一种以熊猫为代表的“文明造型”(modeling of civilizations)。大熊猫从 1961 年起, 成为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会徽(WWF)。“文明造型学”的学说本身也是一种跨学科的新观念, 指世界不同文明包括民族文化用以代表自己民族主体精神的象征与符号, 这种符号具有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特征认同性, 同时更有代表全球多元文明的同一性。



图 1 《夏山熊猫图》, 中国画, 纸本设色, 93×172

Fig. 1 Fang Hanwen Fang Nan Painting of Panda in Summer Hill,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paper painted in color, 93X172.

中国大熊猫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的这种特殊地位形成并非偶然, 它是中国国

**[收稿日期]** 2014-11-28

**[作者简介]** 方汉文(1950—), 男, 陕西西安人, 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化学与东西方比较文学史的研究。

方楠(1980—), 女, 陕西西安人, 文学学士, 凯盈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家文明战略的一个具体步骤,体现了中国文明传统观念。《尚书尧典》中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协和万邦”。<sup>[1]</sup>这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传统原则观念,协和万邦是建立一种和谐的对外关系,处理与不同传统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是和而不同,再与其他文明交往之中实现融合与创新。中国的“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文明对外交往中,丝绸、瓷器、漆器等对外输出,而不同文明的各种物产如西域的骏马、印度的大象、乌弋山离的狮子和犀牛、安息的孔雀、大秦的“麒麟”(即长颈鹿)等输入,成为文明交往的手段,如同大熊猫的文明交往一样。这些物产与其他的精神与物质产品,从科技发明到艺术,大量进入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文明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为新文明的产生进行了准备。历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包括火药、罗盘、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世界传播引导了世界工业化进程,这已经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这些重要的发明应用于欧洲所有基础工业,引起包括轻工业造纸业、印刷业、军事工业与化学工业、交通运输与航海业等主要产业的飞跃。这些发展最终将西方推进到资本主义。马克思曾经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sup>[2]</sup>

马克思所说到的火药、罗盘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都是来自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这个文明大通道进入欧洲,成为资本主义到来的前兆,并且是科技复兴和推进精神发展的力量。

“文明融新”成为当代新儒学话语,是新世纪的时代使然。继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化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1997年中译本出版)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2003年中译本出版),他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其实是一种退回到斯宾格勒、汤因比、爱森斯塔德特之前陈旧理论,但仍然成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之后最重要的热门学说。他把西方民主制度看成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即最高发展阶段,认为“苏联”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的计划经济”

在“后工业经济”时代里,会变得“极不适宜”。虽然他对“苏联”和“中国经济”的判断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相差万里。但是这种比较文明的观念必须研究。于是当代儒学义无反顾地将文明研究作为主题。

新儒学在新世纪更加多元化,领域更广阔。但“和而不同”的观念,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创新即“融新”是核心,这也是21世纪以来逐渐被认同和接受的。和而不同与融新是一体的,只有坚持传统与接受外来文明,才能融合创新。

说来话长,只能简而言之,这两个词其实都是典故,而且是来自古代文明。

“和而不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次出现,《国语》《左传》和《论语》中都有,语源是“济五味,和五声”。这也是先秦学者论说的方式,即所谓“取譬连类”,用口味与声音来类比事之间只有差异并存与结合,才有和谐。说明不同的事物可以相和而相济,却不必完全相同。孔子《论语》中的“子路”篇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种观念属于儒家道德哲学观念,自然也成为儒学基本思想。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的重要论文《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中就提出这是一种“文化原则”,用来“处理不同文化关系之间的准则。”<sup>[3]</sup>这是当代新儒学者明确地将其用之于文化关系,算得上一个理论贡献吧?



图2 方汉文《君子慎独》,中国画,纸本设色,66×123

Fig. 2 Fang Hanwen Gentleman Should be Careful even alon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paper painted in color, 66X123.

当然未可忽视,这种交往同时具有更为深厚的价值,即加强对大熊猫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多种学科包括动物学与植物学、古生物学与生态动物学、地质科学与环境科学等来研究中国大熊猫的物

① 习近平为“汉代—中国汉代文物展”在法国开幕所写的序言,载2014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第一版。

② 另据《光明日报》记者何农所撰写的通讯“大熊猫从中国‘天府’来到比利时‘天堂’”(光明日报,2014,2,23)中报导:“根据2010年国家林业局大熊猫保护办公室的统计,目前有32只大熊猫生活在海外。”

种历史与演变,生物学和遗传学特性、环境与繁殖等相关方面。这一研究在中国从20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正式立项,特别是20世纪末进展迅速,已经有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四川、陕西和甘肃的高等院校建立了多个科研机构,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取得突出成就。尤其是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与陕西汉中自然保护区等研究机构的建立,中国大熊猫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人文科学角度,主要是从大熊猫的造型包括绘画雕塑等艺术、全球的形像传播、摄影艺术、文学与文化研究,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已经有一批中国艺术家与学者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国苏州、陕西、四川、北京、安徽的画家与诗词家、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大熊猫文化研究的论著。其中从理论体系建构方面,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自2003年起,先后出版《比较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比较文化学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论著,进行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受到国际比较文明学会的关注与介绍。

总体而言,中国的熊猫造型研究仍然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形势,主要是因为这种造型研究的根本目标是生态文明观念,而这种观念正处于进展之中。正如环境科学与生态文明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所傅伯杰院士所说:生态文明是跨学科的研究分布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多种学科,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研究。生态文明是当代全球化的重大核心观念之一。

熊猫造型作为生态文明重要内容其意义首先是其认识论价值与本体象征性,这两者是合一的。因为世界性文化符号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一种核心推动力。澳大利亚的袋鼠形象、美国的北美秃鹫形象、加拿大的枫叶、俄罗斯的北极熊、中国的龙凤与阴阳符号、美洲古代阿兹台克文明的水火缠缚的蛇标志、埃及的金字塔等分别成为国家与民族的标志,当然也包括国际奥运会的五环标志、希腊的奥运火炬、NBA公牛队的公牛、甚至可以将象征荣华富贵的牡丹花、高风亮节的竹子、穆斯林的绿色星月、基督教的十字架、交通符号等作为文明造型。这一类文明造型则是重在表现历史事件、民族记忆与想像的符号。文明造型学的核心是对民族标志的象征与符号意义的认证,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指出:“象征仍然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富贵的财富,文明因之才可能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作品:大教堂、金字塔、庙宇、交响乐、雕塑、绘画、宗教仪式、节日、舞

蹈。个性鲜明独特的象征总是那么生机勃勃,而且令人惊奇地反过来影响它的创造者。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们有责任对那些有真正价值的象征物加以讨论”。<sup>[4]</sup>因此,这种认证与通常的“形象学”研究有所不同,形象学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民族或国家的总体与个体所形成的形象的研究,包括对民族或个体的形象感知与印象,如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印象,中国人对西方民族形象的描述等。而造型则是直接以一种文化符号来表达所属与特性,更为直观也更易于接受和具有普遍性。熊猫造型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它包含了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与普世接受性。

不可忽略的是,从世界文化交往来看,这种造型相当重要。大熊猫是世界珍稀动物,现在世界上只在中国发现。据初步研究表明,这种动物自更新纪中期就在地球上存在,有近70万年历史;是著名的古生物化石,曾经广泛分布在多个地区,但是由于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唯有中国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目前存在极少数的大熊猫。它的形象具有自然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古生物物种的科学研究所和地球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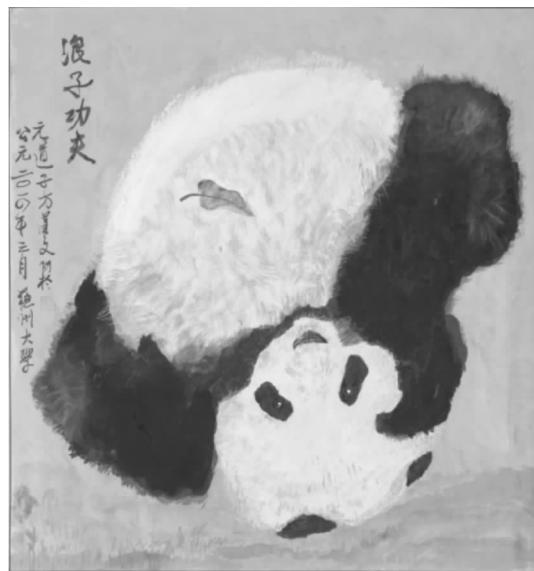


图3 方汉文《浪子功夫》,中国画,纸本设色,45×54

Fig. 3 Fang Hanwen *Kung Fu Showed by the People not Restricted by Rules*, paper painted in color, 45X 54.

古典文献为现代科学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有关熊猫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大雅·韩奕》中:“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献其貔皮,赤豹黄皮。”我们认为,这首诗中写到的走兽貔也就是“貔貅”,指得就是大熊猫。从诗中可以推测古代中国大熊猫分布地域较为广阔,诗中所描写的主要是在河北一带的北方物产。唐代以后的诗中,关于貔貅

的记载就主要集中于南方。一般认为《诗经》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孔子编定的,他在论诗时说道:学诗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就是提倡通过学习诗(主要指《诗经》)不但可以学习文史,也能获得自然科学的知识。《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典籍六经之一,孔子主张通过学诗来学习自然科学,可以看作是较早的提倡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观念。西方文明经历了同样的历程,最迟在公元前10世纪产生的《荷马史诗》是描写古希腊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中有极丰富的造船、战车、航海、武器制造、甚至医学、政治、建筑、占卜等各种古代科学的知识。古希腊哲学其实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研究,比如《伊利昂纪》第十五卷中的“特洛伊木马”就写了特洛伊人高超的建城术与希腊人的工艺。古代社会中,人文与科学之间是合为一体的,是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总体视域。

大熊猫文明交往模式得到联合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与民间的共同认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的、具有独创性又具有中国传统文明特色的造型,具有传统的“和而不同”的本体论、当代生态文明的自然与文化保护观,多元文化融合创新和艺术审美创造的造型,当然具有研究与阐释的价值。

文明造型是民族传统的主体象征与符号,它代表着本民族的历史文明本质特性,以鲜明的形象和能指所指表达出来,在文明交往中具有本土的代表性。文明造型包括两大类型,一类是动物与植物甚至包括人等原初造型,如希腊人以橄榄枝和鸽子作为和平造型符号,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狮子造型。

从审美与艺术层来看,熊猫造型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世界各国观众特别是各国的小朋友们对熊猫

的感情可以用“狂热”来形容,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一种动物植物包括人类受到如此普遍与热烈的热爱,所到之处,以“倾城倾国”来形容毫不夸张。从欧洲宫廷到美洲的幼儿园小朋友,长达数小时地等待观看熊猫,各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旅居美国的大熊猫归国后,每年都有其在美国的粉丝们来中国看望、怀念自己的朋友。熊猫以其色彩黑白分明、形体茁壮憨实,以及潇洒温情、活跃可爱、天真无邪的美好形象成为无可替代的典型形象,如黑格尔美学所说的“这一个”。无论在世界何地,熊猫的图像,永远是一种和谐、祥瑞、平安、友善的象征。而这正是当代世界所追求的,这就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精神。笔者已经在陕西师范大学、美国图兰大学等地举办过三届熊猫生态文明诗文书画展,2014年下半年受美国新泽西大学之邀举办第四届熊猫生态文明绘画书法艺术展,将继续发表论著,研究这种当代有影响的生态文明形态。

## 〔参 考 文 献〕

- [1] 尚书正义. 十三经注疏: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119.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427.
- [3] 汤一介. 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J]. 学术月刊,1997 (10).
- [4] 汉斯·比德曼. 文化象征辞典:前言[M]. 刘玉红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7.

(责任编辑:程晓芝)

## “Integration” of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Panda’s World Harmony Trip

FANG Han-wen<sup>1</sup>, FANG Nan<sup>2</sup>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China;  
2. Kai 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Kunshan, China)

**Abstract:** Panda as a treasure of our coun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s, embodying our national civilization strategy of the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he symbolic communic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means of deepening the friendship via Silk Road and other channels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Panda is very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the communication of which has become a link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rejuvenation for China.

**Key words:** Panda; National Civilization Strategy;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s